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 主编

中国近代 社会文化史 续论

王先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

王先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 / 王先明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10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李喜所主编)

ISBN 7-310-02375-7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241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413 千字

定价:3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且不说司马迁“通天人之际，究古今得失”的远大抱负，就是近世魏源的史学旨趣也要落实在“国计民生”的重托上，即“上之为远抚长驾，考镜得失之资；下之为殚识博通，援核后先之本。”（刘韵珂：《瀛寰志略序》）企求史著的经典性和功用之久远，曾是先天下之忧的“士人”们矢志以求的夙愿。这份厚重的使命诚然令人敬仰。然而，一如变动的时代，我们的史学也在急速的变动之中，无论是史观，还是史识，抑或是史料，其变动的迅捷常常令人惊叹。这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论断的不可置疑性。知识与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生活不断的跃迁，身处其变的学者，真想宁静地固守一片领地——哪怕是极为传统的学术家园，一成不变地寄望于那种所谓“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研究，不免不识时务之讥。当代国际“新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叹言：“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心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的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因此，我不相信我们现在编著的史书能够用上它几十年、几百年，没有一定不变、永远受用之书，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9页）

也许，比之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也是随时而变的结果。它更多地汇集了近年来自己对于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研究成果，其中的所感

所思，所省所察，已在多方面体现着与《史论》之不同，凝聚着本人求新求变的努力。然而，这种变化又并非无根之芽，它是一种续接中的变化，一种根基上的伸展。其实，无论如何求变，史之为史也总有不变的根基。故论史之要在探其全，论史又贵审其源，论史又贵察其派，论史又贵考求古迹（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第 158 页）。由此而言，变在不变之上；所以，以《续论》而名。

人类文化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的“三形态”[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后现代自由经济（知识经济文化）]所以，社会文化本质上是难以分离的。社会形态也是文化模式，社会转型也是文化转型。在社会学中，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几乎重合，所不同的是，“社会”包括主体在内，“文化”则指人类主体生存方式及其成果。因而，无论从历史演进过程看，还是从社会现存状态看，社会与文化是无法割裂的，二者本质上是一个统一体，或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当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与文化史研究的融通与合流趋向。故本书仍从“社会是文化的社会，文化是社会的文化”的视角出发，讨论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些相关的课题。限于学力和识见，本书错讹与谬误当所不免，恳望师长及同人批驳纠正，浅学至为感谢！

还须说明的是，其中部分论文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论文作者，对于论文的引文注释等要求并不如现今规范。笔者收录时未作改动，也是想保留一种历史的实态，将其与笔者后来的研究成果在比较中展示出学术本身演进的轨迹。

王先明

2005 年 2 月 2 日于南开

目 录

前 言	1
-----	---

一 总论篇：学科发展理论探讨

1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3
2 中国社会史学的学科定位	16
3 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26
4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50
5 人、人口与社会结构 ——关于近代社会史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之讨论	60

二 时代篇：变动时代与政制更易

6 革命派和维新派的早期关系与自立军	87
7 中国同盟会形成过程浅论	96
8 吴禄贞与自立军和武昌起义 ——革命派还是立宪派	103
9 革命派对改良派的策略原则	115
10 “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 ——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	127

11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	136
12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 ——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151
 三 文化篇：由传统到近代的文化模式转型		
13	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	163
14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172
15	“合中西为一法” ——近代中国早期西学著作的译述及其历史特征	190
16	西学冲击与近代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	198
17	从痴迷到迷惘 ——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216
18	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	243
19	晚清“中体西用”论再探	258
20	现代化与传统中学的结构性变动	276
 四 社会篇：乡村社会结构历史变迁		
21	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	289
22	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变动的个案分析	310
23	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	341
24	抗战初期“村选”政权结构探析 ——以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几个村庄为例	354
25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370

26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例	399
27	20 世纪之初的农家副业类型与发展动因	
	——以 1912 至 1927 年的山西为范围	418
28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构成及其来源	
	——20 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430
29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	
	——以英氏《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440
30	近代新学教育与城乡分离的加剧	
	——20 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470

一 总论篇： 学科发展理论探讨

1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从 20 世纪之初的“新史学”，到 20 世纪之末的“社会史学”，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趋向。因此，追溯 20 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当会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20 世纪初年，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许多西学理论、方法尤其是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涌入中国知识界，导致了旧史学体系的崩裂和重构“新史学”的努力。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并以“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的《新史学》为方向，已经蕴含着社会史的理念和内容。其后，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史著相继出现，如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以及一些专题社会史著作如 1911 年出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30 年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一批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论著相继面世，其中不乏优秀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 1949 年以后才形成的学科，所以此时的社会史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古代史领域，只有少数著述如 30 年代新生命书局

出版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著作和1949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费孝通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分别从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社会变化、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权力结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融入了社会学的内容。因此，在20世纪史学变革过程中，它们是以典型的社会史著作给人以新的感受。但此类开创性的研究没能继续深入下去。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引人瞩目。但是，从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在偏狭的“阶级斗争”和“三次革命高潮”的圈子里打转，把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因此，无论是从学科意义还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内容大都被包容在以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或者经济基础为意向的一类的研究之中。此一时期寥落散漫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可析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阶层、身份、等级与社会结构研究；其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

应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史学研究观念制约下，近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方面的专门研究是无从谈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作为阶级斗争、革命高潮的背景内容而有所涉及，它的分散性、表面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模式化、教条化制约下的近代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社会史内容在近代史学中的阙如，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因此，社会史研究在1986年后的兴起，也是史学界寻求解决“史学危机”的一种时代回应。社会史的兴起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二

从1986年以来,社会史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近代社会史也在理论体系和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从1986年开始,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就围绕着“研究对象”“学科特征”“学科定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成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学科创建,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乔志强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1]他在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则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论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2]在对近年来社会史学反思的基础上,王先明对现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社会学化的趋向,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史的正常发展,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3]

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对于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主张各异,却始终未能形成激烈的学术理论争辩或学术心灵对撞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气势。这使得学科理论研究呈现出滞后状态。

其二,近代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研究。1986年以来近代社会结构研究走向深入,人们更多关注近代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分层及其地位、角色的多维性研究。徐鼎新和钱小明著的《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侧重于上海商会早期机构的建立和以后的革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做了深入研究。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从“绅商合流的历史回溯”、绅商阶层的形成、社会

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方面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独到论述。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也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分别从各自角度对商人阶层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关系、时代特征、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证。

近代绅士阶层也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一书，通过比较揭示了士绅与士族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则从近代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机制、结构变动、时代转型、阶级分化、历史命运诸多方面，对近代绅士阶层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产物，它的变动趋向从结构上体现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意义与特征。

其三，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相对集中的课题之一，取得的成果也具有相当的深度。作为与传统社会中“士”阶层完全不同的近代知识分子，何时产生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姜义华、李良玉、李喜所等人认为其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20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作为近代知识分子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和传统纲常意识的淡化。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一书系统探讨了洋务知识分子产生的时代背景、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思想观念的更新与矛盾等问题。近代社团是社会结构变迁中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出现及其作用是我们深入认识近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此作了较充分的研究。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结合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和群体意识的分析，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走向的关系，富于新意。在近代社会思潮方面，有高端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的

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专著。高著以专文形式重点分析了近代各种形式的思潮与文化流派及其影响；胡著则把近代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重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进程等。

其四，秘密社会史研究。与以往侧重于会党的性质、宗旨的取向不同，这一时期的会党史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会党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会党与相关民间结社的联系等问题，其社会史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比较完整地揭示了会党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哥老会、斋教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看法。90年代后，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近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等，对于近代秘密社会的组织形式、内部结构、社会成分、门户派系、宗教教义、社会活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使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象。而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则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方面，探讨了黑社会的成因，颇有启发性。

其五，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研究。严昌洪运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勾勒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变革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轨迹。对于古老风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西风俗的冲突与融合，经济政治改革与风尚变迁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4〕}社会风俗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深度具有密切关系，民国社会风俗的变革力度较大，研究成果也呈上升趋势，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中西新旧风俗并存及多样性特征，社会习俗的西化倾向，风俗变迁中的多种因素及其与近代化的相关性，服饰的演变等。民国时期的婚姻状况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如傅建成、李金铮等人的相关论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一是华北地区的早婚现象、原因及社会影响，二是乡村性比例失调及溺女之风问题，三是新式婚礼及婚姻形式的变革。王奇生对于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作了社会学意义上

的分析,并对相关的社会风气、婚姻状况和妇女运动等问题作了分析。朱小田从近代江南妇女职业的变动入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江南家庭棉纺业的没落过程及其对妇女地位的社会影响。对于日军侵华期间的慰安妇问题,苏智良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确认上海杨家宅是日军在华设立的最早的慰安所,中国慰安妇达20万人以上。家庭制度的变化也是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和家庭的功能变化方面。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制度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其代表作。

其六,近代人口、社会问题研究。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结构比较精密的著作。该书分四篇,前三篇根据全面统计和个别事例的结合,分别论证中国近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地理分布的变动和人口结构的发展演变;他在另一部著作中,阐明了“一个多年困扰人们的难题”,即“人口解释历史与历史地解释人口”,^[5]把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池子华则着重分析了近代流民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的负面效应和城市近代化的正面效应。^[6]

其七,区域社会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域社会史的开展。这方面的成果十分突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较早体现这一研究趋向的是段本洛等人的《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著作,其后,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魏宏运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苑书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乔志强等人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钟文典等人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等,分别在论题揭示范围内从社会史角度做了开拓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近期内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走向。

近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相当欠缺。近代社会变迁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和深刻内涵，对于它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体系上和专题领域上同时展开，并相互促进。近年来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专题方面，这不能不在理论视野和宏观架构上影响到研究的深度。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以“社会史”的面貌出现，但其内容和方法、甚至主旨却一仍其旧；而且，平铺直叙过多，缺乏深刻的思考和精到的分析。同时，专题研究也呈现过于碎化的趋向，使社会史研究远离了主体“社会”。

三

从20世纪80年代始，社会史就开始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领域（或学科），但社会史研究终究缺少引领时代的成果和日渐走入琐碎的趋向，却又令人关注。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当如何解脱困惑走入新境，确须认真反思。

首先，要注重研究视角与理念的扩展。尽管学界对于“社会史”的定义歧义较大，从未获得相对一致的认识，但在确定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视点和方法意义上却具有共同性：即定义讨论——研究范围设定——研究课题展开。为了突出社会史独特的学科地位，研究者特别努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区别。然而，研究实践表明，在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是多么的徒劳而又自缚手脚。“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构成社会的人本身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人是惟一有主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种组合：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以及更广义的组合：社会。”^[7]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一个文化系统，在社会结构所包括的任何关系中都有这样一种期望，